



# 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基本时空脉络

刘靖北

社会主义从提出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00多年的发展历程。只有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到了哪里、今后要往哪里去，从而不断深化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性认识，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 从无到有的思想先声

社会主义思想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15—16世纪，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资本主义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得到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也最早产生在英国。1516年，托马斯·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诞生。该书用著名的“羊吃人”的命题，最早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王国。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有德国的闵采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等，他们以极为虚幻的形式展露出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空想社会主义也在不断完善，到19世纪上半叶，空想社会主义达到其思想最高峰，

这就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他们无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和弊病，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积极主张和天才预测，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但是，由于受不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和唯心主义的局限，空想社会主义无法找到实现其社会理想的正确道路和社会力量，因而具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

## 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工人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等一系列人类文明成果，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再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主观愿望，而成为现实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现实的基

础之上，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第一国际”等国际工人组织相继创立和发展，工人阶级政党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和发展，人民第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成为实现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根本政治力量。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理论上的，至于如何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实践，还有待后来者来解答。

## 从理论到现实的转变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矛盾日益激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和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心逐步由西欧转移到俄国。列宁在革命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論，领导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世

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转变。十月革命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推动共产党在各国普遍建立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高涨。列宁领导俄国党和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初步进展并积累了宝贵经验。列宁指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只能根据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的实践来谈论和建设社会主义了。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为特征的“苏联模式”，并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障碍。

## 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一个也未能解决。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联共(布)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其他欧洲各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法西斯斗

争，中国共产党和亚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和参与了本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1945年5月，苏联红军攻克柏林，把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在苏联的帮助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等在二战结束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蒙古以及美洲的古巴等国二战后也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样，社会主义建设就超越了一个国家的范围，实现了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世界大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壮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对人类社会发展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 从中国创造到世界旗帜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我们党较早认识到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提出要独立自主探索适合自己国情

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我们既取得了巨大成就，获得了宝贵经验，也历经艰辛，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经受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的严重冲击和其他各种风险考验，带领人民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仅没有灭亡，也不会灭亡，而且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彻底荡涤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阴霾，重振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自己的伟大创造，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和引领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旗帜。当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展现出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将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 把握党的全球秩序全球治理观念变迁规律

郭树勇

近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民族复兴与人类解放为己任，与时俱进地创新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顺应时代潮流，伸张国际正义，履行国际责任，领导中国人民，团结国际社会，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治理观具有先进性、发展性和规律性。在国际互动、外交指导思想和国际身份等因素的影响下，党的全球秩序观念变迁主要经历了两个转折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为第一阶段，党的全球秩序观受到冷战格局和世界革命等因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与苏联的全球秩序观念相联系，将国际身份定位为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重要成员，呈现出“革命者”与“融入者”的双重秩序倾向并存、前者较为明显的特征；第二个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大，改革开放逐步展开与全球治理观念的使命。全球秩序观是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对于全球范围内系统化力量对比、国际安排与

运行制度的认知，全球治理观是有关国际关系行为体对治理全球性问题的基本看法。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社会日益发展，任何民族、国家、政党均必须依靠科学的全球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来指导对外交往，从相互依赖、国际互动和合作共赢中实现合理的利益。必须继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紧紧地与时代主题相结合，不断调整和创新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观念，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纵览百年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与全球治理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党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党的全球秩序观具有先进性、发展性和规律性。在国际互动、外交指导思想和国际身份等因素的影响下，党的全球秩序观念变迁主要经历了两个转折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为第一阶段，党的全球秩序观受到冷战格局和世界革命等因素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与苏联的全球秩序观念相联系，将国际身份定位为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重要成员，呈现出“革命者”与“融入者”的双重秩序倾向并存、前者较为明显的特征；第二个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大，改革开放逐步展开与全球治理观念的使命。全球秩序观是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对于全球范围内系统化力量对比、国际安排与

革不公正、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和民主化，对待全球秩序的态度上较为明显地体现出全球秩序“融入者”角色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特征；十八大以来，党关于全球秩序观念的创新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更加强调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强调整全球秩序变革引领的使命，更加强调中国是全球秩序的“建设者、维护者和贡献者”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

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治理观是指党在国际主义思想指导下关于全球化、全球社会、世界秩序和人类解放等问题的基本治理理念。党的全球治理观念变迁至少经历了四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即国际治理原则、国际制度观、国际正义观以及国际责任与使命。从近百年发展史看，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治理观念变迁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与世界革命相联系的阶段：建党之初至上世纪70年代，党的全球治理观主要着眼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互动，国际治理原则以支援“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等为核心，国际责任主要体现在为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党的任务是受了被压迫民族的独立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奋斗。其次，与融入国际社会相联系的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至2012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全球治理观念日益完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不断融入世界体系，秉承公平正义的原则推动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与建设和谐世界。最后，与引领全球治理相联系的阶段：十八大以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从上述三个历史阶段来看，党的全球治理原则始终结合了世情、国情与党情；全球正义观始终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期待；国际制度意识与国际责任感日趋积极务实。

近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反帝爱国、民族独立、改革开放和治国理政等辉煌成就，经历了从面对国际社会到融入国际社会再到引领国际社会的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观念重大变化。当前，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面临新的考验，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时代与使命赋予的全球秩序与全球治理观念，在以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在抗击疫情的国际合作中积极贡献中国力量，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决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 历史进程和中国道路

曹泳鑫

近百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最有号召力的党，中国的命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辟了崭新的中国道路，百年中国道路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道路最本质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党，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改造中国进而实现中国化的百年进程。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密钥匙就是掌握并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成功实践。

中国近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囿于当时资本主义道路框架的多种矛盾、思潮和运动均归于幻灭和失败。十月革命是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俄国革命的胜利之路，为社会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传播和实践开辟了新道路，也帮助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重新考虑了自己的问题。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而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大大加速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进程。纵观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都被卷入世界历史的进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区都不是孤立发展的，也就是说，看待世界历史潮流对世界各国、各区域的影响，不能仅仅用外部冲击的眼光，而应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及时抓住了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主开辟了救亡图存、兴旺发达、民族复兴的新道路，指引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

同时也应该看到，世界历史并不必然消灭民族个性，相反，世界历史通过增进各国家、民族间的交往而彰显民族个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民族的才是历史的，正是不同地域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共同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历史进程不可能一直由早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或按照昔日列强主宰的道路演进，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道路充满信心，必将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 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与中共建党

陈红娟

马克思主义文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文本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从事革命事业的前提。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重视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阅读、交流与学习，无论是自主阅读还是党内组织化引导，都对党员的信仰塑造与行为规范起到重要作用。

十月革命前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要在一些转译自日本或英法等国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文章与著作中阅读到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马克思主义文本形式主要以句子、段落为主，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国内所能学习与讨论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相对零碎化。20世纪20年代，除了《共产党宣言》外，可读的相关文本主要是一些解读书籍，如《共产主义ABC》《社会主义史》《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等。此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自主自觉地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阅读与学习，并不是单纯地获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而是从中寻求中国未来发展前途的解决之道。周恩来曾指出，“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宣言》，这

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当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通过自主阅读马克思主义文本初步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曾言：“有三本书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建党前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群体性的讨论交流中凝练共识，确立建党的理念与决心。此时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仍比较有限，研究会、读书会等主要是从《新青年》等杂志上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进行学习与交流，结合社会问题分组讨论，并借助一些纪念日、节日作一些指导性的报告或演讲等。这些以马克思主义相关文本为阅读对象的读书会、研究会为志同道合者提供了物理公共空间，形成了以社会主义为革命走向的人际网络聚合。同时，它们让以往私人阅读转变为一种公开化的集体行为，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载体。

研究会、读书会等在研讨与互动交流中传播了唯物史观，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促进“建党”思想的形成。1920年初，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通过阅读并翻译《共产

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提出“明目张胆地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明确回复蔡和森“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时，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等。此外，这些读书会、研究会的骨干成员日后大部分成为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成员，为中共的成立奠定组织基础，如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逐渐演变为共产主义性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提上日程，中共中央专门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马列著作，最终出版了“马克思全书”3种、“列宁全书”5种、“康民尼斯特丛书”4种，大大丰富了可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同时，从《共产党宣言》版本信息看，1927年以前，在上海、广州、武汉均有出版，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范围日渐扩展。然而，如何在党内系统地开展工作理论宣传教育，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问题。之后，中共中央出台相关文件，对各地党组织有组织、有计划、有程序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引导与规范。1923

年冬，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组织颁发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不仅设置函授部规定其所讲的课程讲义，而且设置图书供给研究主义的书籍。此外，“各地方至少当组织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表面上可取任何名目)。同时可以吸收非同志。”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阅读从党内向党外有组织地进行延伸，“读书会”成为吸引非同志的重要桥梁。此后，革命运动的中心上海和广州，分别建立了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方式的梳理可知，从十月革命到大革命前夕，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从个体自读逐渐成为组织行为，研究会、读书会也从以往松散的社团行为向规范化的组织活动演变。阅读中所形成的知识文化生产深刻影响着政治社会变革。以读书会、研究会等方式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是建党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吸收新鲜血液，扩大基层党组织的重要方式。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全面理解党的扶贫工作

文建龙

谈到“扶贫”二字，很多人马上会想到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工作。世界上有“反贫困”“减贫”“消除贫困”等说法，但只有中国有“扶贫”一说。

在改革开放前，党的正式文件里有“扶持贫困户”“扶持贫困群众”这类说法，但没有“扶贫”一说。直到1979年2月23日，国家民政部发布的《民政部转发黑龙江省民政厅、肇庆县民政科联合工作组关于太平公社扶贫工作的调查报告》(民发[1979]14号)，出现了“扶贫”和“扶贫工作”。此后，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里，“扶贫”“扶贫工作”出现频次明显增多。

在中国共产党那里，“扶贫”的要点是两个：一是“托底”，即不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继续“往下走”；二是“推进”，即要推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向上走”。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党在改善民生方面走的仍然是“托底”的老路子，但不管怎么看，都是扶贫工作。改革开放后，党在扶贫方面探索出了扶贫开发的新路子，即“推进”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向上走”的扶贫方式。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决定了党必须

把实现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事实上，党自成立以来就关心民间疾苦，不断为人民群众争取物质、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权益，并且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严格地说，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工作应该从党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时算起。在根据地开展旨在解决贫困人口生活问题的的工作，就属于扶贫工作。

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扶贫工作，需要把握两个关键。第一，党的扶贫工作有“托底”机制，这其实就是我国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1999年，国家建立起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7年又建立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样，中国14亿人口事实上都有了最低生活保障。第二，党的扶贫工作有“推进”机制，这其实就是扶贫开发这种贫困治理模式。扶贫开发“推进”是一种推动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向上走”的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探索出来的另一种行之有效的扶贫方式。

(作者为潍坊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